

绪 言

道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和儒家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骨架。庄子在道家文化中有着十分特出的地位，他和老子并称老庄，成为道家文化的别称，几千年来倍受关注。因此，研究庄子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颇多困难，也更有意义。

第一节 庄子与《庄子》

一、关于庄子

庄子，作为道家的杰出代表，无论在中国哲学史上，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或中国美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从中国文化史方面研究庄子，应该说，其意义尤其重大。关于庄子其人的描述文字在先秦文献中不很多，只是散见于一些著作中，综合《庄

子》和《史记》中的记载，可见其大略。另外，关于庄子的人格及思想，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们有不少论述。

1. 《庄子》中的庄子

据曹础基参考马叙伦《庄子年表》、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及杨宽的《战国史》梳理而成的《庄子活动年表》，^①称庄子约生于公元前 369 年（周烈王七年、秦献公十二年、赵懿侯六年、田齐桓公六年、楚宣王元年、魏惠王元年、宋桓侯十二年），死于公元前 286 年。我们认为，曹的论证严谨、充分，结论也可靠，可用为据。根据《庄子》的记载，他的生活状况十分艰难。书中说，庄子生活十分贫困，上监河侯家去借粮食，可监河侯不想借给他，就说在得到封邑赋税后借给他三百金。庄子就以来时在路上见到一条鲫鱼为例，说鲫鱼快要干死了，需要一点水活命，他答应到吴越地方游说，取西江水来迎接它，鲫鱼说不用了，等到那时，我都成干鱼了。这足以说明庄子的生活已经相当危急，是庄子生活贫困的一个侧面反映。另外还有一段文字也描述了庄子的生活情况：

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屣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山木》，以下引《庄子》只注篇名）

由此可见，庄子“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屣，槁项黄馘”（《列御寇》）是事实。庄子处在陋巷之中，生活靠织草鞋维持，如此困难，所以他面黄肌瘦，脖子细长，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奇怪可言。

庄子的鲋鱼（鲫鱼）之论，一则说明他的生活状况已非常糟糕，另则也是庄子的一种自我解嘲。

曹础基：《庄子活动年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3期。

但庄子是一位颇有思想的学人，也有一些追随者。他的影响也曾被一些君侯看重。然而，庄子淡泊名利，刻意于自己的自由追求。有两则庄子却聘的故事可以为证：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已死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于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秋水》）

在《列御寇》中有段文字也是讲庄子辞聘的事：

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乎牺牛乎？衣之以文绣，食以刍菽（菽），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

司马迁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也提到过相近的故事，大致是说楚威王听说庄子十分贤达，就派使者请他来作自己的卿相，庄子笑着对使者说道，千金算是很大一笔钱了，作卿相的位子也很尊荣。但是，你就没有看到在郊祭活动中用来祭祀的牛的命运吗？先是养上几年，身上披着绣花的披巾，可一旦到被牵入太庙为人任意屠宰的时候，即便想作一个孤身、无衣食着落的小牛都不可能了。你快走开，不要污秽了我，我情愿在平常污浊的生活中游戏，自得其乐，也不愿意让那些国家的事情来羁绊着我的心志与生活。我一辈子也不会做官，这样，我才可以快活无限。甚至，庄子以腐臭的死老鼠喻官位，以表明自己的高洁人格及对此轻视的鲜明态度。有则故事是这样的：惠施在梁国作国相，庄子前往去见他，有人对惠施说，一旦庄子来了，就只怕会替代你的相位了。所以惠施十分担心，命令举国上下搜查了三天三夜。后来庄子到了去看他，问他知不知道南方有种名叫鹓鶵的鸟，他介绍说，这种鸟从南海出发，一直要飞到北海去，但沿途不是梧桐

树就不落下来休息，不是珍贵的练实就不食用，不是甘泉就不饮用。可路上有只猫头鹰找到了一只死老鼠，正好鹓鶵在天上飞过，猫头鹰十分担心鹓鶵会来与它争夺，就不住地抬头吆喝，发出“吓，吓”之声。你大概要用梁国的相位来吆喝我吧。

庄子不仅轻视官位富贵，而且也对生死之事非常淡漠，体现出逍遥自得的特点。“鼓盆而歌”的故事就可说明这一点。故事说庄子的老婆死了，惠子去吊唁时看到庄子在那里叉开两腿坐着，一边敲打着瓦盆，一边在哼着歌。惠子责备他，认为他老婆跟着他过了一辈子，生儿育女，由老到死，已经够辛苦的了，你不哭也已经够不行了，却还唱歌，这实在太过分了。庄子解释说，她刚死的时候，他有点难过，但想起她出生前原本就不曾有生命，甚至连形体和精气都没有。就是在这混沌的世界之中，变来变去才有了精气及至形体，终而变化成生命，如今又回到了死亡，这本和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没有什么两样，她躺在天地之间这大房子里休息，我却在她的身边啼哭，细细想来，自己太不懂天命了，因而就没有了哀伤。

而且，庄子对待死的态度十分泰然，所以即便在病重时，他的弟子盘算要厚敛盛葬他，他也表示坚决反对。他说：

吾以天地为棺槨，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列御寇》）

可见，庄子是自然主义者，将生死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来对待，这和天地之存在是一样的。所以，他认为“天葬”就行了。或鸟啄，或蚁食，都无所谓，十分自然。这种思想贯彻在庄子毕生的思想取向中。

2, 诸家论庄子

在先秦诸家的著作中，少有人提到过庄子。最早全面提到庄子的人是司马迁。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箝》，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司马迁讲庄子学识广博，综合了儒墨各家学说，这是很中肯的，但认为其文字多空语，这有待分说。

《圣贤高士传》也有叙述庄子的文字：

庄周少学老子。梁惠王时，为漆园吏。以卑贱不肯仕。楚威王以百金聘周，周钓濮水之上，曰：“楚有龟死三千岁矣。今巾笥而藏于庙堂之上，此龟宁生而掉尾涂中耳，子往矣！吾方掉尾于涂中！”后齐桓王又以千金之币，迎以为相。周曰：“子不见之郊祭之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入太庙，欲为孤豚，其可得乎？”遂终身不仕。（《汉魏六朝名家集·嵇叔夜集》）

这里只点了庄子不肯入仕之事，原因归结为庄子位卑，此事也有待详述，但和司马迁之说相合。

南北朝时陈朝释智匠所编撰的一部乐书《古今乐集》中也记载了庄子的事迹：

庄周者，齐人也。明笃学术，多所博达。进准见，方来却睹未发。是时齐湣王好兵事，习用干戈。庄周儒士，不合于时。自以不用，行欲避乱，自隐于山岳。后有达庄周于湣王，遣使费金百镒以聘相位，周不就。使者曰：“金，至宝；

相，尊官；何辞之为？”周曰：“君不见乎郊祀之中，衣之以朱采，食之以禾粟，非不乐也。及其用时，鼎镬为前，刀俎列后，当此之时，虽欲还就孤犊，宁可得乎？周所以饥不求食，渴不求饮者，便欲全身远害身。”于是重谢，使者不得已而去。后引声歌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喻精神，以养素食；避世俟道，志洁如玉。卿相之位，难可苴当。岩岩之石，幽而清凉，枕块寝处，乐在其央。寒凉四固，可以久长。

这纯然继承了《庄子》文本中的说法，其歌也符合庄子的人生观点。除此之外，自清以后，特别是现代，有许多文字对庄子作了评断，很有益于庄子研究。清代治庄大家王先谦是这样论评庄子其人的：

余观庄生甘曳尾之辱，却为牺之聘，可谓尘埃富贵者也。

然而贷粟有请，纳交于监河；系履而行，通谒于梁魏；说剑赵王之殿，意犹存乎救世；遭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见谅于同声之友，况馀子乎！吾以是知庄生非果能回避以全其道也。（王先谦：《庄子集解》序）

庄子的地位问题，郭沫若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在《十批判书·庄子的批判》中写道：从庄子的思想上看来，他只采取了关尹、老聃清静无为的一面，而把他们的关于权变的主张扬弃了。庄子这一派或许可以称为纯粹的道家吧？没有庄子的出现，道家思想尽管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受着温暖的保育，然而已经向别的方向分化了：宋钐、尹文一派发展而为名家；田骈、慎到一派发展而为法家，关尹一派发展而为术家。道家本身如没有庄子的出现，可能是已经归于消灭了。然而就因为有了他的出现，他从稷下三派吸收它们的精华，而维系了老聃的正统，从此便与儒、墨两家鼎足而三了。在庄周自己并没有存心以“道家”自命，他只是想折衷各派的学说而成一家言，但结果他在事实上成为了道家的马鸣、

龙树。

郭沫若的评价是中肯的。就道家而言，庄子的确为光大道家起了极为重大的作用；就中国文化发展的传统看，庄子总结吸收了他以前诸家的思想，为荀子及以后的学术开辟了一条先河，这也合乎庄子的史事。

任继愈对庄子的人格有他的评判，认为：庄子生长于饥寒贫困之中，他曾以实际行动贯彻了他的哲学主张。庄子不慕富贵，不求荣利，对当权的恶势力采取轻视、嘲笑的态度，这就是所谓超政治的“清高思想”。庄子的“清高思想”开辟了轻视传统、轻视权威的先例。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进步思想家，在反传统，反权威，反宗教迷信这些方面，确实吸收了庄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①应该说，郭、任对庄子思想的评断是很独到的，但这种评断远非对庄子全部思想的评断。庄子对文化的作用，除了人生哲学以外，还有其他方面。

3. 故里考论

在历代庄学研究专家所讨论的诸问题中，庄子的故里也是一个比较集中的话题。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中说：“庄子者，蒙人也。”后多为诸家援引为依据。大多数学者认为蒙即今安徽蒙城。另一根据是苏东坡作的《庄子祠堂记》，“庄子，蒙人也，尝为蒙漆园吏。没千余岁而未有祠之者，县令秘书丞王竟始作祠，求为文以记之。”足见，蒙地所具的反映庄子遗迹的古物都是在苏东坡之时建立起来的。苏东坡或许也认同这一说法，但这种说法没有很好的依据。

第二种说法认为庄子应是宋人。曹础基在他的《庄子浅论》

任继愈：《庄子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新建设》，1957年第1期。

曹础基：《庄子浅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中持此观点。他还列举了从汉的刘向、张衡等到今人党晴焚及日本学者泷川资言、中井积德等都认为庄子是宋人的材料。党晴焚还认为庄周是宋庄公的后代。他说：庄氏为宋之公族，当是宋庄公之后代。（宋微子）世家：“文公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须，与武、谬、戴、庄、桓之族为乱，文公尽诛之，出武谬之族。”周之称庄子，因其为宋庄公之后。与孔子为孔父嘉之后而称孔、孟子为孟孙氏之后而称孟一样。曹础基也结合《庄子》中的史事立论，就“桀宋”（宋王偃）的时代作出了对应性的考证。

蔡德贵认为庄子是齐人，他引用了陈朝和尚智匠所编的《古今乐集》为之立论。《古今乐集》说：“庄周者，齐人也。……”蔡还认为，庄子的思想观点与当时的齐国的稷下学宫派的思想有着很大程度的相同之处，并提出，这种相似之处表明庄子是齐国人的结论有其一定的依据。^①就《古今乐集》的文字，曹础基在他的《庄子浅论》中认为是不可靠的。这与蔡德贵认为可靠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从《古今乐集》属于乐书来看，对庄子是齐人的说法就不能说很可靠。因为，这应该不是本书的重点。作者也不会去仔细考论事实。至于庄子思想与稷下学宫派思想的相似之处，其实，道家中的老子思想早已影响了稷下学宫派，而庄子的思想也有继承老子的思想之处，所以，将这种相似作为庄子是齐国人的依据，并不令人信服。

我们认为，庄子应是楚人，理学大师朱熹、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冯友兰先生及其学生涂又光先生都认为庄子是楚人。朱熹在回答他的学生孟子和庄子的时代是否同时的问题时说道：

庄子后得几年，然亦不争多。”或云：“庄子都不说着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迹只齐鲁滕宋大梁之间，不曾过

蔡德贵：《庄学溯源》，《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2期。

大梁之南。庄子自是楚人，想见声闻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学问，所以孟子书陈良云云。（《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

王国维认为：“庄子楚人，虽生于宋，而钓于濮水，陆德明《经典释文》曰‘陈地水也’，此时陈已为楚灭，则亦楚地也，故楚王欲以为相。”^①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第一篇第八章第三节的末尾有一注说：“日人小柳司气太云：“道家渊源的鬻子及发扬光大道家思想的老子、庄子，皆为楚人。更据汉《志》，绢子、长卢子、老莱子、鹞冠子，亦皆楚人。至于其他传说中的隐逸，有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见《论语》）、詹何（见《列子·汤问·说符》及《韩非子·解老》）、北郭先生（见《韩诗外传》卷九）、江上老人（见《吕览·异宝篇》）、缙封人（见《荀子·尧问》），皆楚人。屈原《远游》云：‘曰道可受兮而不可传，其小无内兮其大无垠，毋滑而魂兮彼将自然’，与《庄子·大宗师》‘道可传而不可受，相通。《渔父》辞云：‘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与《老子》‘和光同尘’相通。”^②

今人涂又光在《楚国哲学史》^③中也认为庄子是楚人，他将庄子列为楚国的思想家之一。这种安排应该说有其一定的道理。

除此之外，我们认为还有如下几点理由可以说明：其一，从庄子祖先庄氏而言，楚庄王后庄躄也可以作为其渊源的依据；其二，从《庄子》的文风考察，它富于奇伟瑰丽、超拔桀骜的文学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第五册，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影印版，第 80 页。

冯友兰：《文化史上所见之古代楚国》，《东方学报》东京第一册，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昭和六年三月出版。

涂又光：《楚国哲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06 页。

美学特点，与楚人屈原《楚辞》的文学风格极为相似，足见，二者应有相近似的文学土壤和思想氛围；其三，《庄子·秋水》中有庄子辞楚威王之聘的事，说明庄子可能是楚人。历史上，曾有人提出楚威王聘庄子这一条史料不可信，这种说法有其不妥帖的方面。因为，在战国时代，具有学识的人被统治者聘用之例也不在少数，而且大多数人都为平民布衣，如与庄子同时的孟子就是这样。《孟子》中也提到许多这样的人。足见，这条史料应有它可靠的成分。虽然跨国聘用也有可能，但能为楚国统治者所了解，又怎么不能为本国聘用呢？至少可以证明庄子的观点还是有点道理的。况且楚文化并不拘泥于其本土文化，相反，它对中原文化是采取吸纳和学习的态度。申叔时答楚庄王问太子教育的事就反映了这一特点。

（楚庄王）问于申叔时，叔时答曰：“教以春秋，人为之尊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明也；教以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以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国语·楚语上》）

既然楚人也十分重视中原文化的意义，而且在一些人中间也相当熟悉，自然，楚文化中的内涵就不可小看了。况且到庄子时代，楚国的版图已扩展到了东到大海，西邻巴蜀，南至洞庭，北接黄河的广大地区了。在文化上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被广为传扬；庄子作为一位文士，当然很了解其中的内容。所以，庄子思想就很可能反映广博的覆盖面，洞悉全面的内涵。楚地广阔和庄子思想的深广这二者的切合正说明了庄子的楚人风格。

二、《庄子》考略

关于《庄子》这本书，客观地说，应该说是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庄子的思想原貌。但自宋以来，诸家却不这么认为。所以有了诸多的考释、评价，都认为《庄子》部分反映了庄子的思想。甚至，据考证，内篇系庄周本人作，外杂篇有别的间入，不属庄子的内容。但是，我们认为，《庄子》体系本身就很完整。《庄子》应代表了庄周本人的思想，反映了庄周本人的取向。《庄子·天下》篇对庄子思想有这样的评价：

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时恣纵而不倦，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犛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諛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庄子·天下》或许可以说至少是庄子学派中庄学后人所作，应该可以说是庄子对自己的思想总结，或可谓庄学后人对庄子思想的总结，不管怎样，它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庄子的思想，也是对《庄子》的最早评述了。郭象也同样论述了《庄子》这本书：

夫庄子者，可谓知本也。……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

之自造也。其言宏绰，其旨玄妙。至至之道也，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傲。故曰不知义之所适，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仁极乎无亲，孝慈终于兼忘，礼乐复乎已能，忠信发乎天光。用其光则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长也。

夫学者当以成性易知为德，不以能攻异端为贵也。然庄子闕才命世，诚所英文伟词，正言若反。…今沉滞失流，岂所求庄子之意哉，故皆略而不存。今唯裁取其长 [于] 达致、全乎大体者为卅三篇焉。

郭评真是详而当了，但他以己说为评据，以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来揣评古人，这不实际。但他去掉了一些非常驳杂的文字，留下了 33 篇，这说明现行《庄子》版本，在郭象看来应全部反映了庄子的思想内容。尽管郭象对这 33 篇的作者存而不论，但他在文意上的取向应该重视。王夫之则对内、外篇分别作出了考辨，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庄子》中的内篇与老子的思想相近，但摆脱了老子的那种权术巧诈的风格而另开了一派风格；外篇则只是为老子作了训诂，并没有真正地体现出博大精深的思维特点，最多十分之二三的东西能与内篇相发明，其余都是些浅薄虚器之说，大致是后学杂以各家编辑而成的。

上述引文中讲《庄子》文辞不实，言论不经。从文字体现看，应是正确的。但就本质而言，庄子并非不知本，相反是相当了解本质现实的。如此，这些评论就与《庄子》的本来有了距离了。

《庄子》在几千年的流传中多有变动，存在古本和今本的区别。曹础基认为，《庄子》古本和今本的关系是这样的，他将其表示如

见郭象：《庄子序》。

见王夫之：《庄子解》卷八《论外篇》。

下：

司马迁所见的本子（十余万言） → 刘安本（五十二篇） → 班固本（五十二篇） →

↗ 司马彪本（五十二篇） ↘
 ↘ 崔 譔、向秀本（二十七篇） ↗ 郭象本（三十三篇）

所谓今本是指晋人郭象删定加注的三十三篇《庄子》本，虽经一千六百多年，但流存至今，郭本前的本子便是古本。最早提到《庄子》书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在《老子韩非列传》中称《庄子》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作《渔父》《盗跖》《胠箝》以诋訾孔子之徒”。司马迁认为《庄子》的另一目的便是“明老子之术”，并相信其中一些是“空语无事实”。当然司马迁没有明言他所见《庄子》的篇数，大致在当时还很杂驳，不可拘定，故存而不论。后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到“《庄子》五十二篇。”高诱注《吕氏春秋·必己》“庄子行于山中”说“庄子名周，宋之蒙人，轻天下，细万物，其术尚虚无，著书五十二篇，名之曰《庄子》。”崔、向注本为内七，外二十，无杂篇，计二十七篇。汉成帝时的刘向在《别录》中的佚文中说：庄子，宋之蒙人也。“作人姓名，使相与语，寄辞于其人，故有《寓言》篇。”

与《庄子》书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真伪的争论，即《庄子》中哪几篇反映了庄子本人的思想。“庄子伪作说，自晋代至今，不断滋蔓。这种辨伪的成果之总和，就是将庄周十余万言的大作全部否定了。没有一篇一句是真实可信的。”^①

就历来辨伪成果言，或以内篇真外杂篇伪，这在当代以高亨、关锋和张德钧为代表。认为内篇最能代表庄子的思想。高亨列证了六条，即庄周的主要思想毕具内七篇中，外杂篇皆内篇之余论；

曹础基：《庄子浅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外篇的骨力较内篇为弱，风格较内篇为卑，显非出一人之手；内篇皆有概括篇中要旨的篇名，外杂篇大抵取篇首二三字为篇名；据《胠篋》“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一语证明，此篇作于齐亡之后，此时庄子死已久；杂篇《盗跖》云：“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可见此篇作于周亡之后，是时庄子已死；杂篇《列御寇》云“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此非庄子自撰亦甚明。^①

关锋认为：“内七篇的的确确是一个完整的产生于战国中叶的哲学体系。”并且说，外杂篇不是庄周的作品，其中只有《秋水》、《至乐》、《达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庚桑楚》七篇是庄子后学的较为完整的篇章，《徐无鬼》、《则阳》、《外物》、《寓言》、《列御寇》五篇是庄子后学的佚文。其余，一部分是老子后学的左派所作，一部分是宋钐、尹文后学所作，一部分是杨朱后学所作。从而主张：把内七篇作为庄子哲学体系来解剖批判，而以外杂篇中某些和内七篇相一致的观点作为参考。

以任继愈为代表，一反传统的观点，认为：内七篇决非庄子思想，而是后期庄学的思想。因此，解剖庄子哲学时，应以《盗跖》、《马蹄》、《胠篋》、《庚桑楚》、《渔父》、《天地》、《天运》、《天道》、《在宥》、《知北游》等篇为主，而以其他各篇中相似的观点作为参考。

在讨论内篇与外杂篇的真伪问题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应将郭象所拘定的内外杂篇的界限打破。所以，冯友兰在他的《再论庄子》中提出，“庄之所以为庄者，突出地表现于《逍遥游》和《齐物论》两篇之中。”故而研究庄子哲学应以这两篇为标准，鉴别他篇，打破郭象本的内外杂篇的界限。严北溟也持相近似的观点。他认为：“《庄

^① 高亨：《诸子新笺》，齐鲁书社，1980年版。

^② 关锋：《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中华书局，1961年版。

子》这本书固然不是一个人写的。但确是以庄子思想为主的庄子及其后学的著作总集，庄子是先秦道家各派的集大成者。分析庄子思想应以整部《庄子》出发，反对片面割裂，只根据内篇或外杂篇，甚或限定在某一思想公式、某一种文章风格作为评定庄学的标准。”^①

综而论之，就历来辨伪成果言，或以内篇真，外杂篇伪，或以内篇伪，外杂篇为真，其所述理由大都是有它的心理预设，虽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未必真能解决问题。一般说来，古文的考释随时间的推移其失真率会相应增大。《庄子·天下》和《史记》之评说应更近庄子思想的原貌，郭象的评说也是依乎司马迁的说法及以前的材料，应合乎庄子的思想本来，也可作为庄子研究的重要依据。对于后来的诸多考订中，多以文意为一重要的依据，且各执一端，从而旁引出许多的矛盾，以为自己一家之言，但所执文意多不离郭评及以前的说法，故结论皆不可为据。我们认为，对庄子研究应坚持以庄论庄的原则，这才是解决问题的一条更切实的办法。如罗根泽先生以思想内容为主，把《庄子》一书的内容划分为道家左派，道家右派，道家隐逸派，宋尹派、庄子派、神仙派、战国策士派和儒家派。张恒寿在《庄子新探》和朱锋在《庄子真伪的考论与思想系统的划分》^②中也有着这样相近似的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应有利于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庄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庄子作为一家，有其独特的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演变成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故要全面地把握庄子，就应从庄子思想的全部来着手，所以，要透彻地了解庄子，我们必须以整篇《庄子》为材料

严北溟：《如何评价庄子的哲学思想》，《文汇报》，1962年6月9日。

^② 朱锋：《庄子真伪的考论与思想系统的划分》，《复旦学报》，1995年第5期。

来作出系统探讨，不能偏于一隅，自限头脑。而且，对庄子的研究，不仅要研究庄子本身，而且要研究产生庄子这样一种文化现象的历史原因，并探究出其中的文化意义。另一方面，对历代的庄学研究的结论，也是我们反思的对象，这也是庄子的文化学意义的内容之一部分。应该说，《庄子与中国文化》的真正内涵就在这里。

第二节 庄子现象论

研究庄子，不能拘泥于历史上的特定人物庄子来作出裁定和论辩。从文化学的意义上看，将庄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有其更切实的方面和内容。宜依“同情地了解”的原则，以历史的眼光来评论它，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待它。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庄子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就历史人物而言，不论是日本学者池田知久所认为的庄子乃虚拟的人物的观点，还是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历史上确有其人的看法，庄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实实在在幽游于几千年中华文化长河中，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三因子”说当有助于对此作出理解。文化“三因子”说认为文化由物质层面、社会组织层面和精神生活层面“三因子”构成，社会组织层面介于物质和精神二者之间，是文化的主干，其外在表现是典章制度。在文化变迁时，社会制度的惰性比个人行为的惰性更大，大凡制度愈僵化，其抵抗力愈强。精神生活层面相对于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而言，是文化的核心，包括语言、心理和价值。^①当然，扣到文化概念里，庄子文化只能是狭义的思想文化。如此，肯定会有人对“庄子文

李宗桂：《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文化成熟的基本要求和标志》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化”这一说法质疑，既然可以有庄子文化，那么相对而言也可以有其他的“××文化”了。历史上的人物何其多，这又怎么解释呢？我们认为，这种质疑在理论上是有其依据的。但是在这些被称为“××文化”的里面，它们应该有着自身的特征：这些历史上的思想家必须有其独特完整的思想体系，并能为后人了解把握；从历史作用来看，这些完整的思想体系应该有着其形上和形下两方面的历史影响，既对学术历史发展产生引领作用，又能影响到大众社会生活中去，从人格、价值取向上造就相类似的历史延衍，直到现在以至未来；这里也就提出了这些可称作的“××文化”应该有其生命力，不会随时间流转而湮没到历史潮流中去。庄子文化符合这些条件，这也是庄子文化说法成立的依据。

应该说，庄子文化内容十分丰富，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这个博大系统中的一个个子系统，它有其内在特质，体现为不同的层次。并且与中华民族文化系统中的其他子系统相摩相荡，互融互摄，这既是其生命力的源泉之所在，更是其生命力至为明显的表征。作为一种现象，其背后肯定有着它的原因和理由，这种理由的阐释，完全可以相信，肯定有利于更科学地得出结论，而不会局限于现象的理由来对历史文化作出粗糙的评价。

那么，对庄子文化现象的研究的理论依据在哪里呢？首先是《庄子》一书，理所当然，《庄子》文本也应当是我们立言的依托。庄子文化应有多层内涵，从学术上讲，发掘文本内涵及其学术延伸意义当为首要之事。庄子文化以道体为中心依托，庄子之“道”本之于老子的道论中赋予的本根义含，而提出其道的神性特征，具体就体现在“道”的生化功能上。所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之说便可确证。庄子之“道”的神性特征及《庄子》文本中多处的巫筮内容所渲染的神学特色表明庄子思想受上古原始崇拜和楚地巫风的影响很深。并且，在思想发展路子上，魏晋玄学